

儿童公益生态：发展历程、概念辨析与系统情境

任可 韩茜* 张梦馨 叶思彤

常州大学，江苏常州，213159；

摘要：从发展历程、概念辨析与系统情境三个维度，对儿童公益生态进行深度剖析，在追溯其发展脉络中探寻成长规律，在精确概念辨析中明晰本质内涵，在洞察系统情境中把握内外驱动力。旨在为儿童公益生态的系统构建提供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提升困境儿童的抗逆力筑牢坚实基础。

关键词：儿童公益生态；儿童权益；抗逆力；发展历程；系统情境

DOI：10.69979/3029-2700.25.08.044

儿童面临的风险，是常规与非常规因素^[1]叠加形成的多维度复杂交织体。传统单一维度的干预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困境儿童的复杂需求。儿童公益生态系统建设作为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创新途径之一，在儿童多维脆弱性的识别与干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如何搭建更完善的儿童公益生态系统，使其在儿童抗逆力培育及强化进程中充分施展效能，是当前学界与儿童保护实践领域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发展历程、概念辨析与系统情境三个维度剖析儿童公益生态，旨在为儿童公益生态系统化构建夯实理论根基，进而为切实增强困境儿童抗逆力、助力其健康成长筑牢稳固基石，推动儿童保护事业向新发展。

1 儿童公益生态的发展历程

回顾我国儿童公益生态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1 起步与探索阶段(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初，儿童公益生态系统主要聚焦于儿童保护，关注儿童的基本生存及其他基础权益保障。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除了物质保障外，还需要情感关怀和精神支持。1954 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第 96 条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后续修订的《宪法》在第 49 条中更进一步规定：“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在 1978 年以前，儿童福利主要侧重于对失去监护的儿童进行救济和安置，包括城市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和农村“五保户”中的特困儿童救助。1978 年以后，儿童福利的内涵逐渐拓展，从原本单一的院内安置抚养转变

为养育、治疗、教育与康复并重。尽管如此，儿童福利的治理仍主要集中于机构化养育，关爱保护服务的提供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化体系。在社会总体政策和治理体系中，儿童福利与保护处于边缘地位。

在此阶段，社会开始意识到儿童除了物质需求外，还存在精神和情感需求。1981 年 7 月 28 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成为第一个以筹资形式支持青少年教育、福利事业的全国性社会团体。1985 年，中共中央建议立法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制定保护青少年的相关法律，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2 发展与扩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慈善力量逐渐壮大。1990 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开始步入正轨，越来越多的儿童得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帮助与照顾。2001 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措施，涉及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

2010 年至 2018 年是儿童福利由边缘治理向分散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随后民政部和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首次建立起面向机构养育和散居孤儿的全面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儿童福利范畴的逐步扩展和制度建设的加速。

自 2011 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国办发〔2014〕67 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 号)相继出台。旨在将处于不利

境地的儿童，包括孤儿、贫困、残疾、留守、事实无人抚养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而遭受严重后果的儿童，纳入国家保护体系。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为困境儿童提供支持与保护，已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1.3 多元化与专业化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我国于 2010 年迎来了“儿童福利元年”。2011 年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标志着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清晰地明确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和受教育权利以及相关保护原则。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6 条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的六大保护类别：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

与此同时，儿童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专业化水平逐步提升。2016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各类困境儿童的保障提供了制度性的安排，确立了“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类保障”的基本原则，强调综合运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等政策措施，保障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3]

2019 年，民政部、教育部等十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 号）在“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基础上，细化了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内容，如开展临时照料、康复指导、特殊教育、精神关怀缺失、心理疏导等专业性服务。2020 年后，政府加大对儿童关爱保护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并与社会组织携手开展了一系列关爱儿童的项目。

儿童公益生态系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整合了儿童保护、儿童福利及儿童关爱保护的各项要素，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将儿童保护的刚性约束、儿童福利的资源供给以及儿童关爱保护的柔性关怀纳入统一框架，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保障体系。

2 儿童公益生态的概念辨析

2.1 儿童公益生态的内涵

公益生态系统是指参与和涉及公益慈善活动的各类主体经由互动所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有机”强调的是公益生态系统的自我生长和发展演变的能力，在这

个系统内部，其要素和组件可以更新继替，不同要素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并且整个系统能够持续向前推进发展。^[4]

由此可以推断，儿童公益生态是指在儿童公益领域中，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以及政策、资金、文化等要素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的系统。其核心目标是为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进步。

2.2 儿童公益生态的外延

1 主体层面：当现代社会儿童不再是父母的私人物品，而成为公共物品或社会投资品的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集体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5]儿童公益生态的主体应涵盖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志愿者等多方面。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导力量，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为儿童公益生态提供基础保障；社会组织如基金会、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等，是儿童公益生态的主要实施者；企业通过进行捐赠、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儿童公益；个人包括志愿者、捐赠者等，是公益生态的关键参与者。

2 服务内容：覆盖儿童成长全谱系需求，涉及儿童教育、健康、安全、心理支持、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

3 空间范围：呈现多层次立体布局，从社区、城市到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不同层级的公益组织和项目均在为儿童提供服务。

2.3 儿童公益生态的构成要素

儿童公益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政策、资金、知识工具数据、以及普惠基础设施这四大构成要素。^[6]

1 政策是基石。政府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和儿童群体的需求，制定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只有政府积极促善，在党建引领下，精准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指明方向和目标，儿童公益才能大展拳脚，有枝可依。

2 资金是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丰富的筹资机会、多样的资金来源、雄厚的财政基础是儿童公益生态的定心丸和发展的催化剂。

3 知识工具数据是重要的支撑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资源指南、政策指南、数字工具箱、学习反馈工具、知识库以及发挥培训师、实践团队积极性等。

4 普惠基础设施是链接各主体，保障基本运行的重

要部分。如何做社群建设,如何宣传落实,如何建立完善行业网络,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互联网公益的作用都是基础设施应该回应对接的。

政策、资金、知识工具数据以及普惠基础设施这四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国家儿童公益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在政策的引领和支持下,通过多元化的资金筹集和合理使用,结合丰富的知识、工具和数据的支撑,以及完善的普惠基础设施的保障,儿童公益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的需求,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3 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系统情境

3.1 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宏观情境

3.1.1 政策支持与导向

二十世纪末,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断地发展和调整。近年来,儿童的权益保护得到明显加强,儿童的福利水平有了较大提升。^[7]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健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制度,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等多种模式发展。

3.1.2 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儿童友好城市、友好社区的建设成为一种趋势。2021年3月,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预计2025年,在全国100个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试点工作。^[8]在这一背景下,儿童公益生态的发展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象。在城市和社区规划中引入“1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视角,不仅优化了儿童的生活空间,也促进了儿童公益项目的创新与施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需求和创意相互碰撞,催生出更多富有创意和包容性的公益项目,为儿童公益生态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2 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现实情境

3.2.1 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化

在当今社会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儿童需求不再单纯局限于基本生活保障,而是呈现出多样且复杂的趋势。

完善的公益生态系统对于困境儿童保护尤为关键。相关研究表明,困境儿童普遍面临多维脆弱性问题,体现为个体风险多重性、非正式社会支持匮乏以及福利供给体系僵化。^[2]而健全的儿童公益生态能够构建综合风险评估体系,提供个性化帮扶计划;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增强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推动福利供给体系的多元化。通过上述全方位的支持,助推困境儿童成长。

3.2.2 问题的交织与叠加

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家庭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使传统大家庭式微,家庭支持网络趋向薄弱,邻里间互助氛围也愈发淡薄。与此同时,诸多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愈发凸显。贫困问题导致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与医疗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家庭暴力频发,给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创伤,严重影响其心理与人格的塑造。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绝非单一公益项目可以解决,而应构建儿童公益生态予以回应。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提供保障;社会团体发挥灵活性与专业性,进行多元帮扶;企业在资金与物资等方面予以支持;志愿者给予困境儿童陪伴与关怀。多方携手,为困境儿童提供生活救助、心理疏导、教育辅导等服务,增强抗逆力,助力其实现逆境中的成长与突破。

3.3 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学术情境

3.3.1 儿童保护的学术推动

儿童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对推动儿童公益生态的发展起着引领性的作用。1988年至1998年为初步探索期,儿童保护研究刚起步,相关文献稀缺。此时研究重点聚焦于儿童权利,多从法律视角出发,探讨儿童权利主体地位与利益最大化原则。

1998年至2008年,研究范畴得以拓展。除儿童权利外,特殊儿童群体如困境、流浪、流动、留守儿童的保护问题受到关注,儿童虐待问题也进入研究视野,儿童监护权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008年至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对困境儿童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由法律向服务转变,致力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的建设。随着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进步,彭华民、刘玉兰等学者开始探索社会工作在儿童保护中的专业介入方式,以提高儿童保护的服务质量。这一时期,关于社会工作参与儿童保护的实务研究文献逐渐增多,为儿童保护提供了更为

具体和具有实践性的指导。^[9]

3.3.2 儿童福利的理论奠基

在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学术情境中,儿童福利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我国儿童福利研究起步滞后,学界对儿童福利的关注始于1992年。郭士征、陆士桢对儿童福利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展开了诸多研究。姜丽萍指出,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正朝着法制化的趋向发展,应考虑制订《儿童福利法》以保障青少年的社会福利。

随着儿童福利政策的相继出台,学界对于儿童福利的认知逐步深化,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刘继同、何玲探讨了中国儿童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仇雨临、郝佳针对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吴鲁平等则主张建立家庭寄养制度,以完善儿童福利机构。

2010年至今是中国儿童福利关注度最高且相关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这些新政策的出台有效填补了儿童福利领域的空白与不足。随后儿童福利领域的研究开始迅速增加,研究主题变得更加细化。^[10]这些理论交织互补,为儿童公益生态搭建起理论框架,为实践开展明确方向、夯实基础。

3.3.3 儿童关爱保护的价值引领

在发展儿童公益生态的学术情境里,儿童关爱保护的价值引领至关重要。20世纪初期至1950年,对于儿童的关爱保护主要聚焦于生理安全与基本生活需要,自2000年起,学界的研究涵盖家庭暴力、性别平等、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儿童保护议题。

进入21世纪后,社会转型时期涌现的各类困境儿童问题亟须新的制度予以回应。王梦怡、彭华民认为,对于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南方认为,在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专项资金使用的督导以及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等工作,形成了监督和激励机制。英国学者DaviesL认为,预防与保护机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推动儿童保护政策持续完善。“回归儿童”的价值取向,不仅革新了学术研究,还凝聚了社会共识,吸引更多力量投身儿童公益,全方位滋养儿童公益生态。

综上所述,儿童公益生态并非只是儿童保护或儿童福利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概念。它将法律的强制力、福利的保障性和关爱的人文性融为一体,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的

协同合作,旨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保障网络,为儿童营造更优良的成长环境,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同雪莉,彭华民.非常规风险下的社区抗逆力能力结构与福利治理[J].河北学刊,2023,43(03):172-182.
- [2] 刘玉兰,彭华民.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构建与实践路径[J].中州学刊,2023,(10):75-82.
- [3] 邓锁.法治化进程中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J].东岳论丛,2024,45(01):86-94.
- [4]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催化区域公益生态:基金会的机遇和责任——以福建省公益慈善生态发展为例[J].2019:2-7.
- [5] 马春华.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J].妇女研究论丛,2018,(05):70-84.
- [6] 袁彦鹏.共同富裕视野下——浙江省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调研报告[R].敦和基金会,2022:8-9.
- [7] 高翔.政策文本中的儿童议题发展与有关政府组织系统的变化[J].东岳论丛,2024,45(04):145-152.
- [8] 刘文秀.“1米高度”看世界青岛勾勒“儿童友好城市”蓝图[J].走向世界,2023,(50):56-59.
- [9] 赵芳,朱宁.近三十年儿童保护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CiteSpace和HistCite的图谱量化分析[J].社会工作,2019,(04):95-107+112.
- [10] 张向达,夏聪明.中国儿童福利研究的演进、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24,(01):97-110.

作者简介:任可(2005.5-),女,满族,辽宁省本溪市,本科,研究方向:儿童社会工作

通讯作者:韩茜(2004.9-),女,汉族,江西省新余市,本科,研究方向:儿童社会工作

张梦馨(2005.10-),女,汉族,江苏省南通市,本科,研究方向:儿童社会工作

叶思彤(2005.6-),女,汉族,福建省泉州市,本科,研究方向:儿童社会工作